

历史中的理论建构

“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 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

朱建刚

【内容提要】“官方民族性”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于俄国的一种保守主义思潮，对彼时俄国的文学、历史等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因意识形态问题，这一思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引起学术界重视。乌瓦罗夫是俄国“官方民族性”的创始人，他在特定背景下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特性进行了总结。乌瓦罗夫认为，“官方民族性”以东正教信仰及沙皇专制制度为基础，与俄国民族主义崛起密切关联，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方自我形象的一次塑造。

【关键词】官方民族性 乌瓦罗夫 民族主义 东正教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7)01-0058-0008

“官方民族性”(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一概念常常与“反动”、“蒙昧主义”等词关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东正教、专制、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也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有关。美国斯拉夫研究学者理查德·派普斯曾说：在19世纪30—40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首次（也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前唯一一次）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后来被命名为官方民族主义，它是由一大批保守派学者和政论家推广宣传的，也得到了沙皇的支持^①。美国著名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及：“对这些‘官方民族主义’最好的阐释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同时结合归化和保存王

朝的权力，特别是它们对从中世纪开始累积起来的广大的多语领土统治权的手段，或者，换个表达方式说，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②但安德森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官方民族性”的手段，即“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对于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文化意义完全没有涉及。

那么，“官方民族性”具体谈的是什麼，它的产生背景与后继影响如何，在它诞生之后的近一个

^①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8.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作者简介】朱建刚，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项目编号：15ZDB092)阶段性成果。

半世纪里,学术界却极少有人问津^①。从今天来看,“官方民族性”是时任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特定背景下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特性的总结,它以东正教信仰及沙皇专制制度为基础,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方自我形象的一次塑造。不妨认为:在“官方民族性”三原则中,东正教是俄罗斯的传统;专制制度是俄罗斯的现状;独特的人民性是其屹立于强国之林的未来。笔者拟以乌瓦罗夫的文集为基础,结合俄国及欧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来谈谈这个颇为有趣的话题。

一、乌瓦罗夫其人

乌瓦罗夫在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算不上研究热点,尽管早在1922年,俄国哲学家施佩特就说:“乌瓦罗夫思想的起源尚未得到解决……(他)将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话题。”^②在笔者看来,被忽视的原因多半在于他与尼古拉一世的密切合作。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恰如以赛亚·伯林所言:“颇似我们当代的法西斯强权,是自由与启蒙的大敌,黑暗、残酷与压迫的储存所……”^③乌瓦罗夫提出的“官方民族性”原则、书刊检查制度等等,却偏偏成了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令后世史学家纷纷侧目,视之为沙皇走狗,将其束之高阁。即便是伯林本人,对于乌瓦罗夫的评价也不高:“其人固无自由主义偏好之实,也不愿博取顽固反动派之名。”^④另外,乌瓦罗夫曾与普希金交恶,随着之后普希金声望日隆,与“俄国文学之父”作对的人物,如当时俄国文学批评界三驾马车布尔加林、格列齐、森科夫斯基基本上都被打入冷宫,乏人问津,乌瓦罗夫自然也不例外。

乌瓦罗夫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1801年进入仕途,先后担任驻维也纳、巴黎等地的外交工作,与彼时欧洲文坛名流歌德、斯塔尔夫人、洪堡特等人相识。1811年后乌瓦罗夫从外交界转入教育科学界:先后担任圣彼得堡学区督学、帝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及主席、教育副大臣、教育大臣等职务。他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创始人之一,跟普希金、果戈理都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化上的实干家。后世史学家曾言:“乌瓦罗夫是科学院很好的支持者,在他的支持下,考古学、地理学和历史文献等领域内的

大量俄国官方刊物开始出版。”^⑤他的学术成名作《亚洲科学院计划》(1810年)首先提出了要建立研究东方的专门机构,这不仅有助于欧洲文化的发展,也符合俄国的政治利益^⑥。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大文豪歌德的赞赏。他在给乌瓦罗夫的信里说:“你的打算正是我早已关注并白白浪费了精力的东西。”^⑦正是在乌瓦罗夫的努力下,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出现了比丘林这样的汉学大家。虽然乌瓦罗夫直到1853年即去世前两年才完成硕士论文答辩,但在他的遗物中却保存了上百份欧洲各个科研院所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

乌瓦罗夫的博学多识使其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声名卓著,被誉为“现存文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⑧,他本人也于181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院士。从今天来看,乌瓦罗夫对19世纪上半期俄国教育及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834年乌瓦罗夫领导创办了《国民教育部杂志》(«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成为推广教育政策、宣传教育思想的阵地;在他的提议下,1835年俄国的大学里第一次设置了斯拉夫语言与文学教授讲席;在其

① 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俄国史大家 Nicholas Riasanovsky 所著“Nicholas I &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以及 Cynthia Hyla Whitaker 所著“Origins of modern Russian educatio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Count Sergei Uvarov”(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此书于1999年被译为俄文:Граф Сергей Семенович Уваров и его врем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作者在俄文版前言里说她是在苏联解体后去俄国调研,对英文版的很多观点做了修订。俄罗斯方面对乌瓦罗夫的研究比较分散,一般都体现在某些专著的章节中,还没看到专著面世。比如 Андрей Зорин. Кормя двуглавого орла...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в последней трети XVIII-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ека. М.:2001; Шевченко М. М. Конец одного величия: Вла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печатное слово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а порог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М.:2003.

② Шпет Г. Г.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1989. С. 245.

③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④ 同上。

⑤ [英]J. P. T. 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⑥ 乌瓦罗夫对亚洲文明具有很高评价:“如果把现代发现与建立在最初哲学、宗教思想基础上的古代想象结合起来,我们就完全可以确定:亚洲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Уваров С. С.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 65. 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来自启蒙思想家对东方的美好想象,但考虑到19世纪初东方形象在西欧的逐渐祛魅这一大背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论者眼光的独到。

⑦ См.: Шевченко М. М. Конец одного величия: Вла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печатное слово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а порог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03, С. 59.

⑧ Там же. С. 60.

赞助下，宣扬斯拉夫文化独特性的《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杂志于1841年创刊。

1855年9月4日，乌瓦罗夫去世，留给后人一个充满争议的形象。由于他对东正教的极力歌颂，对沙皇专制的忠诚与维护，激进批评界对其有诸多攻击，比如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称他是个“奴才，尽管在贵族（亚历山大一世）家里学会了上流社会的风度，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奴才”。乌瓦罗夫虽然是“官方民族性”的始作俑者，但他的一生与“东正教、专制、人民性”三原则格格不入，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东正教——他是一个甚至不能按清教徒方式去信仰上帝的无神论者；专制——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人民性——他在一生中从没读过一本俄语书，反而常常用法文和德文写作。”^①当然，也有相对公正的评价，但主要集中在实践方面的活动。比如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契切林对乌瓦罗夫在教育方面贡献的肯定：“乌瓦罗夫是一位真正开明的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高官显贵。他热爱并完全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掌管教育部15年，努力使之达到当时政府倾向下所能达到的高度。”^②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结论也不同，但类似结论显然没有顾及乌瓦罗夫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比如说他对东正教的矛盾态度。

二、“官方民族性”的背景及其内涵

虽然派普斯认为“官方民族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14年乌瓦罗夫的随笔《全俄罗斯皇帝与波拿巴》和1818年在重点师范学院的发言。在讲话中，他鼓励学生从历史中寻找“新的意愿来更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君王”^③。甚至还有有的学者把“官方民族性”的起源推到了古俄罗斯时期，认为那时的战斗口号里“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就包括了三大原则^④。

目前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官方民族性”的详细阐释最早见于1832年乌瓦罗夫作为莫斯科学区教育督办时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的呈文当中。此后在1833年他升任教育大臣时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加以完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乌瓦罗夫本人并没有将三原则命名为“官方民族性”，这一概念是后来学者佩平在其1873年著述《从20年代到

50年代的文学观特征》中提出来的。该书第三章即以“官方民族性”命名：“传统的因素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上升到了完美真理的高度，似乎成为一种以民族性命名的新体制。”^⑤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佩平对“官方民族性”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把这一时期俄国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归咎为“‘民族性’体制在内部秩序、司法和行政方面乏善可陈”^⑥。可以看出，佩平对“官方民族性”的认识主要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并未考虑到民族文化特性这一层面。

众所周知，19世纪30年代在俄国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但如果往前推几年就不难发现：1812年沙皇俄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1825年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导致继位的尼古拉一世深受刺激，对十二月党人及其主张的西方启蒙理念十分警惕，起义失败之后，尼古拉一世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建立了第三厅，加强书刊检查制度，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自由主义氛围为之一变。

直到18世纪末，虽然彼得大帝改革已经让俄国在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大路上狂奔了一百多年，俄罗斯在西欧人的眼里仍然是“化外之民”的形象。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虽也受邀去过俄罗斯，但多半是带着传经授道的使命感去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干脆就认为：“俄国人民还没进步到开化的地步”^⑦。事实上，当时的俄国统治者对西欧也确实存在着崇拜的情结。一味推行西化的彼得大帝自不必说，他之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都对法国

① Соловьев С.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Записки. М.:1983, С.267-268.

②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40-5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Ч. 2.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Н. Чичер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1. С. 25.

③ 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Уваров: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 Посев, 2013, С. 23.

④ Зорин А. Кормя двуглавого орл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последней трети XVIII-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ека. М.: 2001. С. 367. 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这一口号出现的具体时代背景。

⑤ Пыпин А.Н.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мнений от двадцатых до пят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Петербург: 1906.С.95.

⑥ Там же. С. 123.

⑦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8页。

或英国充满了羡慕。可以说自17世纪末以来，俄国的国策就是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先是科技，而后是政治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使俄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崇尚西欧文化的精英人士。这一西化的浪潮到1812年卫国战争结束后突然有了转向。

在入侵俄国之前，拿破仑的法国几乎是欧洲唯一强国，只有英国靠着英吉利海峡与之抗衡。拿破仑的希望就是击败俄国，从而使英国放弃抵抗的希望，统一全欧洲。然而这个梦想在俄罗斯的严寒和莫斯科的大火面前破灭了。俄罗斯人的顽强和英勇把欧洲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正如美国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指出的，从十分现实的意义来看，俄国通过拿破仑的战争，收获不小。首先他从头号强国的覆灭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其次，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中又增加了新的领土^①。不过除了现实的收益外，1812年卫国战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俄罗斯人的心态：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是俄国学习榜样的西欧，尤其是超级大国法国，居然被自己打败了。这种心态的改变，甚至导致了沙皇在维也纳会议上有一种得意、神秘，甚至以救世主自居的情绪^②。正是这种沾沾自得的情绪影响了亚历山大一世晚期的改革政策，使他年轻时代的启蒙信徒转变成一位专横、保守又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君主。也因为如此，佩平在论及“官方民族性”起源时认为它并非始自尼古拉一世，而是源自亚历山大一世晚年。

1825年12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在滨海小城塔甘罗格突然去世，12月26日，一批贵族军官在圣彼得堡发动了兵变。虽然兵变很快被镇压，但诚如伯林所言：“十二月之变，沙皇尼古拉一世毕生耿耿难以释怀。”^③作为君权神授的皇帝，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意味着对沙皇神圣地位的挑战，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种行为缘何产生，这是尼古拉一世极力要搞清楚的。12月29日，根据沙皇旨意成立了以陆军大臣塔吉舍夫为首的“有害社会思想审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进行详尽的调查。1826年5月，沙俄政府结束了对十二月党人的调查，发表了“调查委员会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西方思想对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同年7月13日，在处死5位十二月党人的同时，尼古拉一世发表了审判国家罪人的宣言。宣言特别强调防止有害思想的侵袭，告

诫父母要注意对子女的道德培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国家的道德基础，便是“基于人民自然品质的对于教会的爱、对于皇帝和国基的忠诚”^④。

“官方民族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来。1832年12月4日，乌瓦罗夫向尼古拉一世递交了《莫斯科大学考察报告》，其中涉及了道德状况、教学及大学的普遍风气等问题。乌瓦罗夫认为：俄罗斯学生本质上是好的，但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的腐蚀。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在于对现存教育情况做必要的改变。比如要在学校里加强东正教，增加俄罗斯历史的教学课时，让学生通过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熟悉掌握增强民族自信，这样才不至于轻易成为西方思想的俘虏。乌瓦罗夫说：“正确的，可靠的教育在我们的世纪是必要的，它伴随着深深的信念和温暖的信仰，东正教、专制和人民性那些真正的俄罗斯保守因素已成了我们社会的伟大事业最后的一线希望，最可靠的力量保证。”^⑤

三原则中，东正教和专制的概念比较明确，也比较重要。乌瓦罗夫很重视基督教，他甚至提出：“严格地说来，只有两种文学、两种思想的脉络、两种文明：基督之前的古代文明和基督之后的现代文明。”^⑥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东正教才是人类和社会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基础。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启蒙思想横扫一切的状况，乌瓦罗夫为俄罗斯的稳定感到庆幸：“幸运的是，俄国保持着对救世因素的热忱信仰。没有这些救世因素，俄罗斯就不可能过上幸福生活，强大起来，生活下去。”^⑦不难看到，乌瓦罗夫把东正教的存在看作是俄国在精神上优于西欧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这种对东正教优越性的强调贯穿了整个19世纪俄国宗教史。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认为：“在俄罗斯民族的深处蕴含着比更自由更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多的精神

①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1页。

②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俄国史》，杨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③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8页。

④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页。

⑤ Уваров С.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4. С. 326.

⑥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84.

⑦ Уваров С.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 С. 135.

自由。在东正教的深处蕴含着比天主教更多的自由。”^①但就乌瓦罗夫本人而言，他并非虔诚的宗教徒，对于东正教也没有从理论上进行非常详细的论述。他只是提出了要把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源泉这一命题，以此贯彻到学校教育和文学创作中去，从而与西方的启蒙思想抗衡。对于东正教在理论上进一步的展开是由后来的斯拉夫派完成的。

专制是保证俄国政治稳定的基础。乌瓦罗夫说：“君主专制构成了俄国政治存在的主要条件。俄罗斯这个巨人屹立于此，就像屹立于自己伟大的奠基石一般。陛下的无数臣民都感受到这一真理：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与政府关系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切。救世的观念——即俄罗斯生活在强大、仁慈、开明专制精神中并受此保护——应当深入到国民教育中去并与其发展。”^②专制并不等于“暴政”，相反东正教观念下的君主专制可以令不同阶层的臣民受到保护，得到发展。这种观念，在后来的斯拉夫派思想家霍米雅科夫、萨马林等人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

关于人民性，乌瓦罗夫的定义并不明确：“人民性不在于往前走或停顿，它不要求思想的停滞。国家的组成就像人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外貌，面容（черты）每年都变，但面貌（физиономия）不会变。”^③笔者的理解：乌瓦罗夫笔下的人民性实质上是宗教性和专制性的合二为一，具体到生活中，人民性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东正教的虔诚与对沙皇的忠诚。这一点和当时别林斯基等人强调启蒙思想的论述有很大不同^④。甚至可以说，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性”是一种反启蒙的理论。在阐释了宗教性和专制性的基础上，乌瓦罗夫对俄罗斯的民族定义是：“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этнос），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сообщество），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⑤

除了理论上的论述之外，乌瓦罗夫还陆续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强化俄罗斯社会的民族认同感：比如对以启蒙思想为主的私立学校教学招生设置诸多限制；通过1835年的大学章程取消了高校的自治权利；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但提高了教授的待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首次在大学哲学系建立了俄国史、俄国文学、俄国文学史教研室，进行本民

族文化的宣传工作。

乌瓦罗夫毕竟深受欧洲启蒙精神熏陶，并不是顽固的蒙昧主义分子，这就决定了他鼓吹“官方民族性”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愚昧、落后状态。从今天来看，“东正教、专制和人民性”这三原则并非通常所谓的反动或蒙昧主义手段，它既有现实的意义，即保证俄国远离欧洲革命动荡，又有文化上的意义：对这三原则的强调显然也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这两种意义互为因果：为了要避免革命，所以要强调民族特性；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保证了它能远离西欧的革命动荡。如此公开声明自身与西欧的不同，在整个俄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

三、“官方民族性”的影响

作为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思想基础，“官方民族性”的提出显然对社会思潮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诸多俄国文学家、思想家对俄国与西方关系的重新审视上，进而开始强调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优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彼时所体现出的弊端有了更多的认识。“俄国—西方”“西方—俄国”成为当时许多作家、思想家考虑的问题。虽然我们只能说后来出现的“斯拉夫派”是“官方民族性”的产物，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显而易见。

刚刚在文坛成名的果戈理，对于乌瓦罗夫提出的三原则表示非常支持^⑥。他在1833年年底致普希金的信里夸奖了乌瓦罗夫：“不过乌瓦罗夫是很有经验的。他匆匆提出然而充满智慧的意见和他对雨果生平观点的深刻思想使我更增加了对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40. 转引自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 Уваров С.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 С. 135.

③ Там же. С. 136.

④ народность既可译为民族性，又可译为人民性。实质上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坛，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论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从普希金、果戈理到别林斯基等人都对此做过具体的说明。参见张铁夫：《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载《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官方民族性”概念作为当时的一种阐释，因其官方背景而往往被人视为反动、蒙昧，实则不然。

⑤ Зорин А. Идеолог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я-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народности»: опы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6. № 26.

⑥ 关于果戈理受到乌瓦罗夫影响这一问题，参见Виноградов И. А. Гоголь Н. В. и Уваров С. С.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М.: 2003.

他的了解。且不说他关于六音步长短格诗体的想法了，真是才思敏捷，语言知识富有哲理。我相信他在我们这里会做一番事业，要比吉佐在法国更强。”^①

除了夸奖之外，果戈理还以实际创作表达了他对“官方民族性”思想的支持。比如，他在1834年当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之后，接连写了多篇论文（《论世界通史教学》《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等等），谈及他对历史授课的设想，其主题明显与乌瓦罗夫所推崇的历史教学有关系。此外，果戈理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塔拉斯·布尔巴》就主题来说，也是弘扬了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尽管后来的研究者一般不太乐意将这部名作与“官方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小说展示了哥萨克人为了民族解放、生存自由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首先，斗争的矛头指向是作为异教徒的波兰人。波兰人在斯拉夫人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信奉天主教，是西欧文化东扩的急先锋（直到今天似乎都是如此）。因此在果戈理的笔下，哥萨克人与波兰人的斗争不是为了通常的土地、金钱，而是为了信仰而战。“众所周知，在俄罗斯大地上为信仰而奋起的战争是何等有力的战争，因为没有比信仰更强大的力量了。”^②其次，在与异教徒的战争中东正教彰显了自身的伟大与美好前景。塔拉斯·布尔巴最后的呼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等着吧，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正教的俄罗斯的信仰，这一天正在到来，并且一定会到来！如今远近四方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正在出现自己的帝王，世界上将没有一种力量会不屈服于他的！……”^③这样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呼声，在果戈理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很难听到。此外，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果戈理晚期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也能从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起源。作家晚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一书，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官方民族性”的特征，由此也遭到了别林斯基的极力批判。无论如何，正像著名宗教哲学家津科夫斯基指出的：“果戈理是我国第一个回归完整宗教文化的预言家，是东正教文化的预言家。这是他的主要思想之所在，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在这里得到展开并获得深化的。”^④

除了文学界，“官方民族性”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波戈金、舍维廖夫等人的极力支持。波戈金是莫

斯科大学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历史学教授，他在第一期《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彼得大帝》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即如果说彼得大帝为俄国历史开辟了欧化阶段的话，那么尼古拉一世则在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之后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民族化时期。在1846年出版的《俄国历史札记》中，波戈金又重申了这一点：“亚历山大一世确立了俄国对欧洲的优势，终结了俄国历史的欧化时期；沙皇尼古拉的统治则开始了独特的（民族主义）时期。”^⑤意思是尼古拉一世开始关注俄罗斯民族自身的特性，不再像以前的沙皇那样一味崇尚西方了。这就把“官方民族性”与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

舍维廖夫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他从教育学角度审视俄国—西方教育之优劣，在当时也着实发人深省。他的文章《一个俄罗斯人对现代欧洲教育的看法》（1841）发表在《莫斯科人》杂志创刊号上，因其立场鲜明、意义深远而被后人视为该刊纲领性文件^⑥。他先从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一事谈起，认为“拿破仑想把自己的名字加诸现代人类之上，但他遇到了俄罗斯！”^⑦舍维廖夫说世界历史中往往出现一对一的角斗现象，如希腊与罗马，到现在是俄国与西方。“现代历史的戏剧是由两个名字体现的——其中之一温柔地召唤着我们的心灵——西方与俄国，俄国与西方。这是从一切历史中得出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最新话语；这是面向未来的两种当下。”在提出了“俄国与西方”这一主题之后，舍维廖夫着重分析了四个国家的教育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其中的法德教育为例。舍维廖夫认为：法德是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产物，两者都是一种疾

① [俄]果戈理：《果戈理书信集》，李毓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② [俄]果戈理：《米尔戈罗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③ 同上，第195页。

④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2页。

⑤ Погодин М. 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трывки. М.: 1846, С. 34.

⑥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自1841年发表后，再也没有重版过。直到2007年才由俄罗斯教育科学院（РАО）的Л. Н. Беленчук发现后发表在《东正教圣吉洪人文大学导报》（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2007年第3期和第4期上。См.: Беленчук Л. Н. Взгляд русского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 Шевырев С. П. // 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 Серия 3, 4: Педагог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2007. № 6, № 7.

⑦ Шевырев С. П. Взгляд русского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 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 2007. Вып. 3. С. 148.

病。“我们曾以为他们的病已经好了，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不，我们错了……他们的传染病在我们与之热情拥抱时已经传染给我们了。我们被他们思想的奢侈所吸引，痛饮思想之酒，醉醺醺的。”^①舍维廖夫把西方启蒙思想视为“传染病”，并指出了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性，这显然与当时别林斯基等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但如果联系到 19 世纪中后期波德莱尔、尼采等人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我们会发现，舍维廖夫等人所推崇的反启蒙理念并不等同于反动和愚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思想的先驱之声。

四、总结

历史已经证明了，尽管“官方民族性”是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试图定位自我形象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它得到了部分保守主义文学家政论家们在创作上和舆论上的支持，但从最终结局来看，“官方民族性”显然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及其支持者强调了宗教和专制的合理性并将其上升到俄国民族特性的高度，这是当时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激进思想家们所不能容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公开信（1847）就直言不讳指出：“皮鞭的宣扬者、愚民政策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黑暗势力的卫士、野蛮行为的歌手，您要干什么？……看看您的脚下吧：您已面临深渊……一些伟大诗人，不管是真诚地还是非真诚地，一旦去为正教、专制和民族性理论效劳，很快就会声名扫地。”^②这种激烈的反应足以说明“官方民族性”理论在俄国社会所受到的反弹。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这一事实，更直接在现实生活中宣告了“官方民族性”的彻底破产。

然而，真理有时确实会姗姗来迟。“官方民族性”中所包含的对东正教的认知，对专制制度的实质性把握，实际上是后来俄国文学家思想家们审视俄罗斯民族的切入口。就像跨入新世纪后中外学术界对《与友人书简选》的重新认识一样，作为一种对俄国在 19 世纪初面临的民族身份定位问题的解答，“官方民族性”在今天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也因此得以逐步改变它原来呈现在历史上的面貌。比如在 2010 年出版的《乌瓦罗夫选集》里，当代俄国学者 B.C. 巴尔萨莫夫

教授就从两个方面对乌瓦罗夫三原则做了评价。从一方面来说：“……乌瓦罗夫三原则比自己的创建者活得更久，在俄国社会思想的长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的官方思想家每当提及遏制改革、保存传统根基问题时便会转向乌瓦罗夫。说实在的，它恰恰指明了什么才是应当保存的东西。”由此可见，虽然乌瓦罗夫算不上是俄国保守主义之父（因在他之前还有一位资格更老，影响更大的尼古拉·卡拉姆津），但他对俄国民族特性的概括与归纳显然得到了后代思想家的认可。巴尔萨莫夫教授还指出“官方民族性”的另一重意义：“正是在与它的争论中，许多思想——尤其是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得到了发展。不考虑这一因素就很难理解别林斯基在反对乌瓦罗夫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民族性概念。”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学术界通常把别林斯基等思想家视为革命、进步的代表，也一再强调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思想经历了重重斗争才在俄国传播开来。但斗争的另一方究竟如何，我们却往往不得而知。“官方民族性”虽然有“官方”的字眼，也支持沙皇专制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官方民族性”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恰如雅努斯的两幅面孔，只是俄国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这一大背景下对俄国特性的不同理解罢了。借用高尔基论及 19 世纪保守主义作家的评语来说：“这些作者对俄国历史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固定的、合乎逻辑的看法，他们也有自己的发展俄国文化的工作计划，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是真诚地相信祖国不能走另一条道路。”^③在今天看来，乌瓦罗夫对俄罗斯的定位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也显得粗糙或简单，但首先他的出发点是“真诚的”，立足点是本土的；其次，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层面上的形象自塑；再次，这一理论中所概括的俄国东正教思想与俄罗斯民族性的内在联系，在不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中已得到了充分证明。仅此三点，“官方民族性”便值得我们今天详加分析。（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Шевырев С. П. Взгляд русского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 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 2007. Вып. 3. С. 150.

② 袁晚禾、陈殿兴主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4、177 页。

③ [苏]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7 页。

“Official Nationality” and the Ris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early 19th Century — Taking Sergey Uvarov as an Example

Zhu Jiangang

Abstract: “Official nationality” was a conservatism thinking rising in the 1830s. I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literature, history, etc, of the then Russia. However, because of ideological issue, this trend of thinking hadn’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a long time. Uvarov was the establisher of Russian “nationality”. He made a summary of the traits of Russian national culture in a specific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Uvarov, “nationality” was based on Orthodoxy and Tsarist Autocracy; it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ris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it was a shaping of self image by the Russian author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Keywords: Official nationality; Uvarov; Nationalism; Orthodoxy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и подъем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начале XIX века — на примере теории С.Уварова

Чжу Цзяньган

【Аннотация】 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явившаяся в 3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и оказавша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и историю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Однако, в связи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эта теори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е привлекала серьез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аучных кругов. Автором теории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граф 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 который в конкрет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бобщ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 культурную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огласно этой теории,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глубоко религиозен и предан престолу, 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составляют непер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ия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подъемом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явилась формой самооцен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Уваров;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